



对上海地区 经济思想发展的 历史考察

DUI SHANGHAIDIQU JINGJISIXIANG
FAZHAN DE LISHIKAOCHA

钟祥财 ●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钟祥财●著

对上海地区
经济思想发展的
历史考察

DUISHANGHAIDIQU JINGJISIXIANG
FAZHAN DE LISHIKAOCHA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责任编辑 卞 淦 国 梁
封面设计 闵 敏

对上海地区经济思想发展的历史考察

钟祥财 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新华书店 上海发行所经销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5.625 插页 2 字数 380 千

1997 年 1 月第 1 版 199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 7-80618-273-X/F · 370

定价：25.00 元

绪 言

上海是中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城市之一。上海经济的发达有一个历史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经济思想作为客观社会经济的反映同时又反作用于社会经济的意识形态,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我之所以撰写这部《对上海地区经济思想发展的历史考察》,就是要在上海城市史的研究中新辟一个领域,剖析一个新的层面,以为上海的现实发展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

和任何新课题的启动一样,本书首先面临的问题是如何界定上海经济思想这一学术范畴。对此,我的考虑是这样的:第一,由上海人在上海提出的经济思想当然是本书的研究对象;第二,上海是一个移民城市,许多经济学者虽然原籍不在上海,但其主要或重要经历地是在上海,他们所提出的经济思想也属本书论述的范围;第三,上海籍的著名经济学者,尽管其经济论著并非在上海发表,其内容也不限于上海经济(大多是全国性的经济问题),本书也将其列入探讨之列。另一方面,上海是一个建制较晚、后期发展较快的城市,体现在史料数量上就形成了早期资料匮乏而后期史料杂多的特点,本书在史料的选择上,以其观点新颖、在全国经济理论界有一定学术影响者为佳,因此,尽管鸦片战争以后,尤其是本世纪 20 年代以来,上海经济思想的史料可谓汗牛充栋,但入选本书的人物和论著仍属有限,这是需要加以说明的。

本书将上海经济思想史划分为三个时期来加以考察。第一

时期为鸦片战争以前古代上海的经济思想；第二时期为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时期的近代上海的经济思想；第三时期为五四运动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的上海经济思想。三个时期的经济思想都与上海的经济文化发展密切相关。

上海，简称沪，别称申，古称云间、沪渎。关于上海地区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可上溯到三代。春秋战国时期，上海地区是吴越两国争战的场所，其归属也时有变化。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上海归会稽郡管辖。在南朝的梁、陈时期，上海地区曾建前京、胥浦二县，隋时撤废。唐天宝年间，设华亭县，上海市即处华亭县东北境的华亭海。此后，华亭一带的经济有较快的发展，到北宋时期，出现了上海务之名，这是上海的最初得名。到南宋末年，上海镇初具雏形。元至元年间，有人建议分设上海县，得到朝廷批准，并于至元二十九年（公元1292年）正式成立。上海设县以后，经济日益繁荣，其中农业发展迅速，植棉业新军突起，盐业日见兴盛，海外贸易不断扩大，并出现了具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城市新式手工业。与此相适应，上海的文化思想也愈加活跃和丰富，从而为经济思想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鸦片战争以前的上海经济思想，具有比较浓厚的商品经济特点。春秋时期著名的经商理论由计然提出，它的出现显然同当时吴越一带发达的社会经济有关。此后，无论是叶李的纸币管理论还是陆楫的高消费论，都是商品经济一定发达程度的产物，而这种发展水平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是处于领先地位的。另一方面，传统农业思想经与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理论相融合，形成了徐光启的杰出农业思想，这是古代上海经济思想的又一特点。

上海开埠以后，随着西方社会思想的进一步传播，一批具有开放改良意识的思想家纷纷提出了新的经济观点，这些开风气之先的人物或在上海从事学术研究，或在上海投身实业创办，或

在上海进行实际考察,从而形成了颇具近代特色的经济思想,像王韬、马建忠等人的观点曾在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产生过较大的影响,郑观应、徐润等人则集企业家与思想家于一身,为促进上海近代经济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而钟天纬则作为熟知中西学术思想的研究者,在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重要演进上颇有建树。

但总的说来,古代和近代的上海经济思想还没有在全国占据主要的地位,这一方面是由于上海社会经济虽有显著的发展,却尚未达到全国经济中心的程度;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上海毕竟还不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以依附于政治色彩很浓的传统经济思想的产生和发展而言,上海的环境显然无法和历代的王朝都市或经济区域重心相比。

尽管如此,上海经济思想的理论重要性在近代以来是越来越明显了。本书的论述将表明,从1919年到1949年的30年间,上海经济思想史的学术成果超过了过去两千余年的总和,而且在许多方面走在了当时全国理论界的前列。具体而言,从1919年到1949年的上海经济思想在三个方面是较为独特的:其一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创始人和30年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有关论述;其二是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和以后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有关论述;其三是一批民族资本企业的创办者或经营者的有关论述。这三类经济思想构成上海现代经济思想史的主体,在全国范围内可算是独一无二的。可以说,上海经济思想史发展到1919年至1949年这一时期,是达到了它的鼎盛时期了。

上海经济思想之所以愈来愈成为全国经济理论的一个主要中心,是与上海城市文化思想的发展和社会经济的繁荣直接相关的。众所周知,上海早在五四运动前夕已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

心之一,就经济思想而言,不仅西方经济理论在这里得到最广泛、最迅速的传播,而且国内著名政治家、经济学家大都在上海发表过各自的见解,实际上,上海逐渐成为全国经济理论的重要论坛。

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其经济思想曾是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上最优秀的组成部分。从上海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其主要经济理论的提出要稍后一点,即在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但这些理论的历史意义显然更为重要和深远,如孙中山的《实业计划》、朱执信等人的货币革命论等,都曾引起过巨大的社会轰动,并对以后的经济学术界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再如宋教仁的经济思想虽较零散,但却透露出当时中国资产阶级对国民经济重大问题的决策意图或构想,具有很强的实际参考价值。至于30年代的货币思潮中较有影响的褚辅成的货币革命论,则直接是孙中山、朱执信、廖仲恺等人主张的延续。

将马寅初和谷春帆等人的经济思想放在资产阶级革命派一章中加以分析,主要是考虑到他们与中国资产阶级有较多的联系,而实际上他们作为资产阶级的进步学者或许更为贴切。作为留学海外的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的中国经济改造论堪称中国近代以来最重要的经济学论著之一,而谷春帆的工业化理论则代表了当时的一种经济思潮,即把工业化作为中国经济实质性发展的必要途径和契机。上海当时还有其他学者参与了这次讨论(如褚葆一、漆琪生等),这显示了上海经济思想已达到了较高的理论水准。

上海又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活动的中心城市之一。当时蔡和森在党的机关刊物《向导》上发表文章,瞿秋白等人则在党创办的上海大学开设社会经济学课程,他们的理论贡献在于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促进了中国社会经济的科学的研究。进入

30年代以来，一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者在上海成立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他们发表的一系列论文虽然以农村经济为重点，实际上却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宣传的继续和深化。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期间王学文等人的经济论述由于科学揭示了中国社会的性质，从而为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如果说中国共产党人在上海提出的经济思想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上海产业工人的根本利益，那么上海民族企业家的经济思想则是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集中体现。上海是中国民族资本企业的发祥地之一。1866年，中国第一家近代民族资本企业——上海发昌机器厂在虹口诞生。进入20世纪以后，尤其是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为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有利条件，上海民族资本企业的发展速度加快了。据有关资料统计，从1912年至1930年，全国新设厂商共1975家，其中上海一地就占了837家^①，这当中绝大多数是民族资本企业^②。各种产业门类趋于齐全，计有纺织、面粉、机器、化工、水泥、轻工、银行、房产、保险、航运、码头、百货商业等。到20年代末，上海已成为全国乃至东亚的工商业经济中心之一。上海民族资本主义的繁荣，显然与民族企业家的创业经营思想分不开，而后者又是前者的理论升华。

上海的民族企业家作为特定历史条件下中国新兴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其经济思想具有双重的特点：一方面，追求剩余价值是其资本运动的根本目的，这体现了资产阶级的共同本性；另一

① 《北洋时期工商企业统计表，附表二》，载《近代史资料》，第58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86—290页。

② 如1921年开设的上海工商企业共49家，其中民族资本企业为43家，其余1家为中外合资，另5家不详，参见同上书，第212—272页。

方面,由于他们是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本国封建经济解体的过程中产生的,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和旺盛的资本扩展冲动使他们的经济思想更具创新特点。本书的研究表明,上海的民族企业家不仅有企业经营管理的独特见解,而且还提出过有关国民经济宏观发展的理论、主张,他们的经济思想既受中国传统经济观念的影响,又在不同程度上汲取了国外经济理论的合理成分。这点作为上海民族企业家经济思想最具地方特色的理论,可以说是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发生历史性变化的重要标志之一。

撰写城市经济思想史在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研究中是一种尝试性的工作。在我刚刚萌生这个课题设想时曾询问过有关同行的看法,他们的疑虑是:经济思想史是一个没有区域界定的学术范畴,怎样才能准确地、科学地勾勒出上海地区经济思想的历史发展过程呢?这是对我的研究所提出的很高的要求。我没有把握说,这部书稿已经完满地体现了我的预期目标,但我确实在充分积累原始资料的基础上,试图对这一新的研究领域作一番探讨。为了慎重起见,我把书名由原来的《上海经济思想史》改成为今名,以避免在体系和内容、名与实上存在不必要的误解。

目 录

序	马伯煌 黄汉民	(1)
绪言		(3)
第一章 鸦片战争以前上海的经济思想		(1)
第一节 计然的经商理论		(2)
第二节 叶李的钞币条议		(5)
第三节 陆楫的高消费议论		(9)
第四节 徐光启的经济思想		(13)
第五节 陈子龙的经济思想		(21)
第六节 李雯的经济思想		(28)
第二章 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时期上海的经济思想		(34)
第一节 冯桂芬的经济思想		(35)
第二节 李鸿章的经济思想		(53)
第三节 王韬的经济思想		(59)
第四节 徐润、经元善的经济思想		(70)
第五节 钟天纬的经济思想		(77)
第六节 郑观应的经济思想		(87)
第七节 盛宣怀的经济思想		(108)
第八节 马建忠的经济思想		(114)
第九节 张謇的经济思想		(127)
第三章 五四运动至 1949 年上海的经济思想(上)		(142)

第一节	孙中山的实业计划论.....	(144)
第二节	廖仲恺的经济思想.....	(156)
第三节	宋教仁的经济思想.....	(165)
第四节	朱执信的经济思想.....	(172)
第五节	褚辅成的货币革命论.....	(181)
第六节	章乃器的经济思想.....	(186)
第七节	马寅初的中国经济改造论.....	(196)
第八节	李权时的经济理论.....	(215)
第九节	杨荫溥的金融论和交易所理论.....	(228)
第十节	唐庆增的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	(239)
第十一节	谷春帆的工业化理论.....	(249)
第四章	五四运动至 1949 年上海的经济思想(中)	(260)
第一节	蔡和森的经济思想.....	(261)
第二节	安体诚的经济学方法论.....	(274)
第三节	瞿秋白的社会经济论.....	(282)
第四节	王学文的中国社会经济形态论.....	(292)
第五节	沈志远的经济学方法论.....	(302)
第六节	孙冶方的经济理论.....	(308)
第七节	薛暮桥的农村经济研究理论.....	(323)
第八节	钱俊瑞的经济理论.....	(328)
第五章	五四运动至 1949 年上海的经济思想(下)	(338)
第一节	朱志尧、陆费逵、聂云台的经济思想.....	(339)
第二节	郭氏家族、简氏家族的经济思想	(354)
第三节	荣宗敬、荣德生的经济思想	(374)
第四节	穆藕初的经济思想.....	(400)
第五节	陈蝶仙的经济思想.....	(414)
第六节	王晓籁、方椒伯的经济思想	(425)

第七节	刘鸿生的经济思想.....	(436)
第八节	张嘉璈的经济思想.....	(451)
第九节	吴蕴初的经济思想.....	(461)
第十节	陈光甫的经济思想.....	(466)
后记.....		(485)

第一章 鸦片战争以前上海的经济思想

上海地处中国的东南沿海。早在原始社会，这里就居住着辛勤劳动的炎黄儿女。春秋战国时期，这里属吴国疆域，当时的江南地区，“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①，但某些区域内的商品经济已有一定程度的存在。自汉及唐，由于兴筑海塘，农业生产有了较快的发展。入宋以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恢复和提高，农商经济的长足发展，及至政宣、建绍年间全国经济继东晋政治、经济中心南迁之后，其重心再一次向江南转移，今上海之属的青龙镇已呈“海舶百货交集，梵宇亭台极其壮丽，龙舟嬉水冠松江南，论者比之杭州”的繁荣景象^②。元代设置上海县，在农业、手工业、海上运输业发展的推动下，上海逐渐成为东南沿海的一个重要商业城市，其中尤以土布贸易为甚，到了明末，这里已有小苏州之称。清代前期，上海地区的封建商品经济和农业生产力水平提高，农业经营方式和地租形态发生演变，手工业中商品性生产比重增加，在沙船业和染踹业中还出现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

鸦片战争以前，就上海区域而言的经济思想发轫当首推计然的经商理论，他的理论达到了当时国内商品交换学说的最高水平。其次则是叶李的钞币条例是中国古代纸币发行的经验总

① 《史记·货殖列传》。

② 光绪《青浦县志》卷2，“疆域下·镇市”。

结和管理制度化产物；陆楫的高消费议论反映了上海地区经济发达后的观念嬗变；徐光启的农业发展论则体现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最初动向。然而无论是陈子龙还是李雯，他们的经济思想都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封建末期的衰象和社会经济的历史性变动。

第一节 计然的经商理论

计然，名研。《吴越春秋》作计硯；《越绝书》作计倪。一说姓辛，字文子，葵丘濮上人。也有人认为计然是越国大夫文种^①，还有人将计然作为范蠡^②所著篇什来处理^③。这里根据有关计然的资料加以分析，综合勾勒出计然经济思想的大概与要领。

计然的经济思想包括两个主要内容，其一是有关平调粮食价格的理论；其二是有关经商获利的积蓄之理。这两种理论都是中国古代商业发达的意识反映，在经济思想史上具有深远的影响。

一、农业丰歉循环论 粮食价格之所以会发生剧烈的波动，在一般情况下主要是由于自然条件的变化所导致的农产品收获量的丰歉，因此在计然的粮价理论中，有关农业丰歉的预测理论是一个重要的前提。计然的这方面见解体现在这两条史料中：《史记》记载曰：“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已。故岁在金，穰；水，毁；木，饥；火，旱。……六岁穰，六

① 赵捷民：《计然即文种》，《光明日报》1962年5月9日。

② 范蠡，字少伯，楚国宛（今河南省南阳市）人。曾为越国大夫，灭吴后出游，传说改名陶朱公，经商致富。

③ 如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74页。

岁旱，十二岁一大饥。”^①《越绝书》中的文字有所不同，其中说：“太阴三岁处金则穰，三岁处水则毁，三岁处木则康，三岁处火则旱。故散有时积，余有时领，则决万物不过三岁而发矣。……天下六岁一穰，六岁一康，凡十二岁一饥。”^②

上述见解是建立在古代天文学基础上的。计然的看法是，农业的丰歉同木星的运行有关，木星在天空的相对位置，大约以12年为一个周期，这种转位规律会影响到地球的天气变化，从而导致农业生产也发生以12年为一个周期的丰歉循环。如果了解了这种自然规律，人们就有可能预测将来的年成，并制定相应的农业生产措施。应该肯定，计然的农业丰歉理论虽然还是一种缺乏精确论证的臆测，但其中包含着某种不可忽视的科学成分，它的出现，显示了中国古代经济学者的聪明智慧。

既然农产品的供求关系会发生较大的变化，其价格波动也就不可避免了。计然认识到，农产品价格涨跌幅度如果过分剧烈，则将严重损害农民或商民的利益，因此有必要采取调剂平价措施。他指出：“夫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平粜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③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平粜的提法。《史记》一书没有对平粜的具体内容进行记载，后人只能从《汉书》中有关李悝的史料里得到说明，^④尽管如此，计然重视粮

① 《史记·货殖列传》。

② 《越绝书·计倪内经第五》。

③ 《史记·货殖列传》。

④ 李悝（约公元前455—前395），一作李克，曾任魏国中山君和魏文侯的相。他指出：“善平籴者，必谨观岁有上中下孰。……大孰则上籴三而舍一，中孰则籴二，下孰则籴一，使民适足，贾平则止。小饥则发小孰之所敛，中饥则发中孰之所敛，大饥则发大孰之所敛，而粜之。故虽遇饥馑水旱，籴不贵而民不散，取有余以补不足也。”（《汉书·食货志上》）

食价格对社会的影响问题，并强调对其进行一定控制，这既反映了古代国家对府库、市集管理的加强，又体现了古代思想家（他如管仲等）对农贸市集平准机制必要性的认识，因而具有值得称道的理论意义。

二、经商理论 所谓积著之理，是计然对经商获利所应遵循的原则总结。他写道：“积著之理，务完物，无息币。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贵。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财币欲其行如流水。”^① 他深刻认识到：“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物之理也。”^② 从这种定理出发，他主张：“阴且尽之岁，亟卖六畜、货财，以益收五谷，以应阳之至也。阳且尽之岁，亟发籴，以收田宅、牛马，积歛货财，聚棺木，以应阴之至也。此皆十倍者也。”^③

显而易见，计然的经商之道同样是以预测为重要依据的，而且这种预测不无朴素辩证法因素。他认为产品价格的涨跌都有一定的极限，超过这一极限便会向相反方向波动；他主张经销商应该具有超前远见，掌握时机，既充分储备即将热销的商品，又及时抛售即将疲软的商品；他强调保证商品质量；他注意加快资金周转速度；所有这些都与商业经营的客观规律和道德规范有相通相合之处。在农商经济不很发达的古代社会，巨商大贾可能利用这些手法来牟取暴利，但在一般的意义上，计然的积著之理是有利于商品经济发展的。

也许正因为如此，越王采纳计然之言，“修之十年，国富”^④。

① 《史记·货殖列传》。

② 《史记·货殖列传》。

③ 《越绝书·计倪内经第五》。

④ 《史记·货殖列传》。

范蠡亦赞赏说：“计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①他将此运用于私家经商，“遂至巨万”^②。可以说，古代越国地区经济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计然之术的。

第二节 叶李的钞币条议

叶李(1242—1292)，字太白，一字舜玉，杭州人。曾家居上海，在南宋末年因上书反对贾似道而被流放。后隐居于富春江。元世祖时应召任御史中丞、尚书右丞等职。

南宋景定年间，贾似道推行公田法。公田法规定官员、百姓私有田地的限额，额外的田地则由国家按比例收买为公田。以后又规定凡田二百亩以上者官买三分之一，田价由会子、度牒、官诰等支给。与此同时，南宋政府加征苗米，以致当时华亭县的田赋税额激增，超过旧额 158200 石，土税粮总数达到 422820 石^③。这是上海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重赋。面对这种横征暴虐，家居上海地区莘庄的太学生叶李极为愤慨，他在上书中指陈“公田之害，惨于青苗；似道之罪，浮于安石。”^④颇有为民请命的气概。对于社会经济的其他问题，他也时有论及，曾建议设立行司农司和木棉提举司，实施征盐、课醋等税收措施等。尤其值得分析的是，他在元世祖时拟定了一个发行钞币的条文规定，对封建国家发行和管理不兑换纸币提出了具体而周密的见解。

元代的货币流通在中国历史上是占有一种特殊地位的，“蒙古人统治中国时，对中国的币制，带来一种基本的变革，就是使

① 《史记·货殖列传》。

② 《史记·货殖列传》。

③ 明正德《松江府志·田赋》。

④ 转引自唐振常主编：《上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21 页。